

# 乡村是创作的『宝水』

乔叶文

常常如此：有些事情在开始的时候，我懵懂至极，只能在以后的过程中慢慢知晓命运赋予的深意，比如故乡对于我写作的影响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，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乡村孩子，师范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回了豫北老家乡下教书，四年后被调到县城工作，几年后又调到郑州，直至三年前又来到北京。迄今为止，乡村生活在我的人生比例中所占的时间份额约是三分之一，都浓缩在二十岁之前。随着离老家越来越远，我对乡村和乡土文学的理解也有一个漫长的发酵过程。在河南文学的谱系中，乡土文学是很强大的传统力量。或许有点叛逆，我年轻时特别不喜欢乡土，写作时极想逃避乡土这个概念，总是试图保持距离，甚至反抗。多年前有评论家曾问我，有不少前辈作家都有或曾有过自己的写作“根据地”，也可称为地缘上的“原乡”，将之视作精神上的源脉或是情感上的情结，甚或创作中的一贯风格和手法。他们通常有一个甚或数个精神原点，或是相对固定的写作地域。在你的作品中并没有看到某种一以贯之的精神情结或地域元素，你内心有没有一个潜在的写作生地，或是说隐秘的精神原乡？

“没有，在这方面我没有明确意识。”我当时很决断地这么回答。还分析原因说，这应该跟生活背景和成长环境的差别有关。许多前辈的乡土记忆完整坚实，就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性资源。他们建立的文学世界不可避免会受到这种记忆的影响。我们这代人的漂泊性更强一些，一般也没有长期的固定的乡村生活经验，写作资源相对来说也零碎一些，当然也可能多元一些。

但其实，怎么可能没有呢？只是彼时不自知。不过没关系，时间会让你知。这么多年过去，悄然回首就发现自己的小说写作有了两个方向的回归。一是越来越乡土性。作为一个河南籍作家，近年来虽然已在北京工作和生活，但地理视野的多维度似乎让我的乡土性更鲜明了些。二是越来越女性化。之前我还不时地有男性叙事角度或中性叙事角度，如今几乎全是女性角度。也许在很多人看来，身为女作家进行女性化写作似乎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原点选择，可对我而言却是一种命中注定的精神的返程。

如果做个粗略的盘点，小说《最慢的是活着》或可算作是比较明晰的回归标志，它是我非常有读者缘的一篇作品，前后出过六七十个版本，马上又有新版了。它所引起的反应让我不断地去想，从民间到文学界，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小说，或许是因为它写到了乡村情感，或者说祖孙情感那么一种很基本的感情，也可能是乡土自身的魅力。

接下来写的几个长篇小说，《拆楼记》《藏珠记》都有乡土背景，且都是女性角度。《拆楼记》是以河南老家的拆迁事件为背景，《藏珠记》是以河南的豫菜发展为背景……它们都与家乡有很密切的关系。在这些写作中，我也都在追寻我乡村的根脉，不断地去理解它。

《最慢的是活着》之后，我已经意识到自身的乡村经验是最重要的，但这种乡村经验被封存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用它，尽管我写《最慢的是活着》时用了一些，但还远远不够，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换句话说，写个长篇小说对我来说是件特别“严重”的事。而且写乡村的长篇我也本能地知道特别复杂，我不敢轻易动它。

## 二

2014年，我去了河南信阳市一个名叫郝堂村的村庄，那里山清水秀，特产就是信阳毛尖。我发现这个村庄和我记忆里的村庄不大一样，村民不光是去外面打工，也有回来安居乐业的，然后老老少少齐整整，一边务农一边做生意，在家门口相对自洽地过日子，这种业态我觉得特别好。当时我就想我是不是可以为此写一个小说，那两年往郝堂村跑了很多次，写了一些散文。

从2014年到2016年，我基本上有了一个长篇小说的雏形，但后来发现有个很大的问题。豫南和我们豫北的风土人情差异挺大。举个例子，郝堂村待客的时候，拿出的是信阳毛尖，零食是小河虾，但我们豫北的日常生活不习惯喝毛尖茶，也绝对不可能出现小河虾这样的零食。关键是我没有真正在郝堂村生活过，我对于它而言始终是一个外人，我的童年情感也无法和这里打通。我认识到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。

虽然写了几十万字，有效字数却非常少。我琢磨了一下，发现此地因陌生而具备的吸引力，此时又成了我难以打破的障碍。因我的童年，青少年没有在这样的存在里生长过，所以即便做了很多功课，也还是感觉有一层隔膜。这隔膜似薄实厚：长篇小说要求内部这口气必须贯通，也特别考验写作者对世道人心的洞察，需要深入肌理地去了解社会规则、人情世态。但我到了豫南那边真的就是个外人，人情世故每一点我都觉得陌生，也不是多去几次就能贯通得了的。写的时候最关键的这口气贯通不下来，这就很要命。

2017年我回了趟老家，回去后发现贯穿整个长篇情感的那一口气，原先老堵到这，下不来，回老家后马上就下来了。不得不承认，人情世故真就是一条很牢固的线，自小生于斯长于斯，就很容易进入生活内部，写长篇的这口气突然就通了。虽然这些年我也不在家乡生活，有一定的陌生感，但这种陌生感容易被打破。不过我也没有直接选择原生的平原村庄作为主体，经过慎重斟酌，我把主体定位到了南太行山村，并选了两个村子作为长期跟踪的点，深入探访寻找想要的东西。山村的自然风光好一些，同时我老家山村也在发展乡村旅游，我在信阳那边了解到的新变化在老家基本也是同形态的，那就两边并行观察。很快我第一章已经有了，还是按一年十二个月来写，但后来发现这么架构的话，里面的人物、故事情节会被切碎，这个空间节奏对我来说是不行

的。于是我转向四季的结构，它松弛有度，在最大程度上给了我自由。

这些说起来都是写作时走的弯路，但也都是必要的。而且之前在信阳的积累也没有浪费，很多素材仍可用。比如因为我在信阳写采茶，做了很多功课，去年底写了个短篇叫《你不知道吧？》，发在了《四川文学》。采访这种功课做得再多都不会浪费，因为它就像一匹特别大的布料，比如写一个长篇如同做了一身衣裳，你做完这身衣裳，还会留下零星的布头，可以做件袜子、手套、手帕等等。且还有意外所得：信阳那个村走得比较靠前，正好可以和老家这边形成链条上的接续性。而老家这边的村子因为转型刚刚起步，既有很多传统的东西保留，同时也有现代化的东西，其封闭与开放所引起的冲撞和博弈在人心人情里的震荡更为激烈、丰饶，各种气质杂糅在一起，非常迷人。

## 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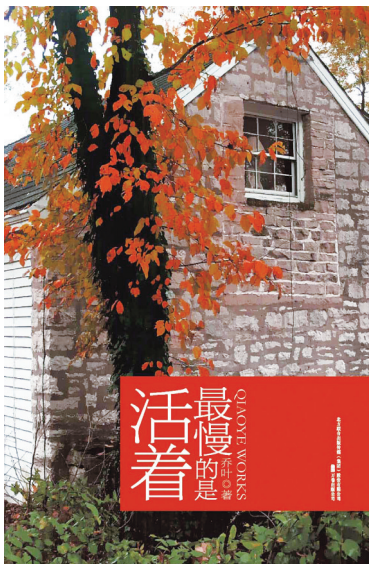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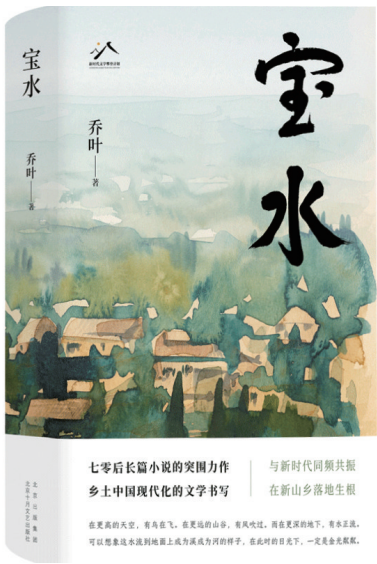
但还是很难。贯通这口气只是首先碰到的难，接踵而至的难可谓各种各样。比如对这个当下性题材的认识就很难。因为很少有现成的创作经验可作参考，也因为当下的一切都在跃动弹跳，难以捕捉。再比如结构之难。我在小说里设置了多重结构，有心理结构、地理结构、故事结构、时间结构等。心理结构就是以女主人公青萍的心理变化为主线，地理结构则是故事发生地宝水村的文学地理规划，包括它要分几个自然片，哪个片是核心区，核心区里住着哪些人家，谁家和谁家挨着住，以及村子周边有什么人文景点，游客来要走什么线路等，都需要反复斟酌。时间结构上，我想写乡村的一年，而这一年如



乔叶在老家田间。

乔叶，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，北京作协副主席。著有《宝水》《最慢的是活着》《认罪书》《走神》等多部作品。曾获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、庄重文文学奖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、人民文学奖、北京文学奖、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等多个奖项，其中《宝水》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。

新乡村的新，不是从臆想中来，  
只能从生活里来，  
这种新，  
是属于生活自带的生生不息的鲜灵灵的新。



一个横切面，横切面意味着各种元素兼备：历史的、政治的、经济的、社会学的、人类学的、植物学的等，这是乡村题材必然具备的。我是希望写到乡村的各个切片，呈现出开阔性和丰富性。包括各种游客的声音，也代表人们对乡村的不同看法，那么矛盾也好，碰撞也好，博弈也好，我都希望尽可能把它们容纳进来。想让切出的这一面足够宽阔和复杂，自然也意味着难。

起名字也颇费琢磨。在《宝水》中，我给郑州另起了一个名字，叫象城。老家焦作，另起的名字叫予城。予，人称代词，相当于“我”。《宝水》中的叙事角度，就是第一人称的“我”。而象和予合在一起，就是豫。据《说文解字》，豫本义是大的象，所谓象之大者。因远古时期的河南一带有很多大象活动。象城，予城，我敢带自珍地喜欢着小说里的这两个地名。象城，确乎像城，却到底不是纯粹的城，在这农业大省，它还有着各种或隐或显的乡村元素。此象确实大，大如乡村，大如土地。对这大象的了解和表达，我总如盲人，《宝水》的写作便如盲人摸象。但无论如何，也算是在真切地摸着。摸到的每一处，都亲熟如予城的予。而予城所指，就是我的城，我们的城，我们实地的城和我们内心的城。

小说里的宝水村属于怀川县。于我的记忆而言，怀的第一要义不是怀抱的怀，而是怀庆府的怀。怀庆府是老家焦作的古称。因为怀庆府，老家所属的豫北平原的别名就叫怀川，又称牛角川，因它由狭至宽呈牛角状。牛角川四季分明，日照充足，地下水充沛，无霜期长，雨量适中，是一块丰腴之地。极有代表性的特产是四大怀药：菊花、牛膝、地黄、山药。尤其山药最负盛名，人称铁棍山药。主要人物的名字我也都敢带自珍地喜欢着。动笔之初就决定让青

萍姓地。老原这个原，就是原乡和原心的原。孟胡子全名孟载，孟即是梦。大英要姓刘，她是留驻乡村的坚决派。杨镇长的绰号叫“烩面”，像河南这样的地方，像郑州这样的城市，也确实是最合适吃烩面的。吃着烩面你就会知道，也只有这样的地方，才会有这样的美食：那种倔强的香，笨拙的香，筋道的香。九奶奶迎春，姓何。青萍奶奶必须叫王玉兰，因为我的奶奶就叫王玉兰啊。

我外婆很早就去世了，我奶奶活到了2001年，八十多岁，她去世六年后我写了《最慢的是活着》。后来我反复确认，觉得奶奶是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根本出发点。当初写《最慢的是活着》的时候，我哭过很多次，其实后来——直到现在，每次想到还是有那种想哭的感觉，奶奶对我的意义是我逐步认识出来的。

我小时候老跟奶奶“干仗”，觉得我跟她不一样：她是封建社会出来的，而我生在新中国、长在红旗下。但后来我知道奶奶特别聪慧，缠脚只缠了一半，她是有反抗精神的。所以表面上我们因为时代的局限很不一样，但很多内在的精神性的东西是相通的。再有就是她对生活的认识，我原以为是很保守的，但它们实际上是非常牢固、坚韧的存在。比如她讲宽容，“你对别人宽，自己才能宽”，这是特别朴素的道理，到今天都不过时。有时候想到奶奶，我会感慨生活就是大浪淘沙，淘出了金子一样的东西。

我们兄弟姊妹五个，都是奶奶带大的，我爸爸是独子，学习也挺好，我爷爷当时是军人。1951年，我爷爷在最后的西南剿匪中牺牲，他军衔还不低，所以那时有的人说他太不会去世了，大丈夫都完了，他却在零星小仗中离开了。《最慢的是活着》是中篇，只有3万多字，很多东西我没有把它们尽情地释放出来。所以到《宝水》，我给青萍奶奶起名王玉兰。

至于语言，小说本身的一切就决定了最适合它的语言调性：语言主体必须来自民间大地。而这民间大地落实到我这里，最具体可感的就是老家豫北的方言。近几年里，我总是随身带着一本老家方言的资料书，写小说时方言声韵就一直在心中回响。从小浸泡在这语言里，我现在和老家人聊天依然且必然是这种语言。但方言使用起来也很复杂，要经过精心挑拣和改良才能进入文本。河南的原生态方言是极度简洁的，比如我老家方言说教育孩子是“敲”，宠爱孩子是“娇”。有句俗语是“该娇娇，该敲敲”，意思是该敲打的时候要敲打，该宠爱的时候要宠爱。但直接用过去，恐怕很多读者会不明所以。因此我琢磨一下，改为“该娇就娇，该敲就敲”，这样既保留了原来的味道，又不至于让读者困惑。

此外还需要学习辨析山村风物，体察村里人在农民和生意人的身份中如何腾挪，也需要对乡村诸多关系重新梳理和审视：村民间的邻里关系，居住在繁华地段和偏远地段的村民间的关系，村民和村干部的关系，乡贤和村干部的关系，乡镇干部和村干部的关系等，都需要再去认识和表达，所有这些都是必须克服的障碍。当然，障碍里也尽是宝藏，就看挖矿的人有没有力气，手艺又如何。对这些难，除了耐心去面对，我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。我真就是一个笨人，所谓的经验都是笨的经验。无数次痛恨自己笨拙，也嘲笑自己自讨苦吃。然而，等到终于定稿成书，却顾所来径，也还是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，很值得。

## 四

《宝水》经常会被贴上“乡村振兴”的标签，就我个人的初衷而言，其实就是想写历史背景下活生生的这些人。每个村庄都有它的历史，我希望写出历史或者文化的纵深感。我希望我笔下的宝水村是一个中间样本，它不多先进也不多落后，不多富裕也不多贫穷，它可能是居于中间状态的，符合更多数的乡村样本，这对我自己来说是更有说服力的。

这样有些问题就是共性的，比如现在在很多城里人会将乡村视为繁杂生活之外的喘息之地，但我会来回站位，会想，凭什么城里人就对乡村人有道德要求，说你们就应该淳朴？现在农家乐很普遍了，城里人都是一种观光客的心态，但在这儿扎根的人，他们是活生生地在这过日子的，柴米油盐，一定要有利润才能可持续发展，不然乡村振兴就凭情怀去做，特别空。而一旦产业落地，就要算很多账。所以小说里就算了很多的细账，村民怎么定价，怎么盈利，他们自己要做很多内部研究。这属于乡村内部很隐秘的部分，一般观光客是不关心的。

但我觉得青萍这样一个居于乡村内部的人，她一定要看到这些，而且能和她的童年乡村经验连接起来。那些长久靠田地生活的人，他们是怎样的生存状态，当他们必须面对农耕传统向商业模式的转变，他们的情感、他们的人际关系会出现怎样的变化，我觉得这是小说很重要的一个部分。

而且青萍一开始排斥、抗拒乡村的人情世故，认为正是因为这些束缚，自己的父亲才会意外身亡。但后来青萍渐渐理解了乡村的社会生态和生活逻辑，这其实也是我自己成长中的转变。写作时，作家和小说中的人物心理同步是很自然的。小说中青萍到宝水村去，一开始是很忐忑的，因为她觉得自己受到过乡村的伤害，所以这个小说的叙述温度最初是冷淡的，后来才逐渐有了温度。她背负着年少时的创伤来到宝水村，其实是以当下的宝水村来理解她过去的乡村生活，理解她过去的困惑。

在写作中，我与女主人公青萍一起成长，一起被治愈。比如2001年我调到郑州工作后，经常会遇到老家的人找我办事，孩子上学、家里人看病等等，好像因为我在郑州，就能结识所有有用的人脉。这对我来说当然是非常头疼的。我那时对此经常生气，恨不得把他们都拉黑了，但这么多年过去，现在肯定不是这样了，我开始理解他们的局限性和不容易，当然我也会和他们好好讲。过去我觉得他们完全不可能理解我的难处，都不屑于解释，简单粗暴，但实际上，好好讲他们还是会理解的。

其实，小说的创作过程，也是对乡村持续体察的过程，让我也深切感受到了生活是创作的“宝水”。对乡村长时间的浸泡和观察，让我获得了丰富、生动的细节。比如村里人都种菜，以前互相藕对方地里一把菜都没关系，后来大家都开始做农家乐和餐饮，一把菜炒一下装盘能卖20块钱；家住偏僻地段，种的菜很多，要卖菜的话，他们的选择往往是去镇上卖给陌生人，而不是村里的熟人；开客棧客源多，住不下的客人，如果介绍给关系好的邻居时，是要提成的，还是下次互相介绍客人？这些小事都很新。那种传统的以物易物受到了商业化的冲击，会带来复杂微妙可爱的心理改变。

所以，新乡村的新，不是从臆想中来，只能从生活里来，这种新，是属于生活自带的生生不息的鲜灵灵的新。这新不能被看见，能被看见多少，都是对小说家的某种考量。好多东西还真不是想当然坐在那想的，你只有到实地后，才能知道它们能多么出乎你的意料。如果你不是走马观花，而是沉浸式地去看，就能感觉到这种新。



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  
关注公众号“零度往上”